

# 关于古籍整理的笔谈

## (三)

### 对整理古籍的一些建议

郭绍虞

整理古籍，经史子集。文化所萃，学业所积。何意四凶，妄肆荡涤，焚之毁之，不遗余力。“古为今用”，非排往昔，“推陈出新”，仍尚因袭。不左不右，有分有析。古籍何罪，视同仇敌。整理说兴，和者不息，欣贡芜辞，颜唐老笔。

陈云同志指示整理古籍，欣而作此。

陈云同志提出整理古籍的指示，非常重要，而且及时。文化的创造与提高，原是多方面的关系，而且是长时间的问题。爰本此意提些建议：

一、整理与保存兼顾 整理标准宜严，保存的范围可广。有些古籍清代学者已加以整理，为适应现代需要，可再作一番整理。这就比较复杂了。好象前人作注，后人作疏。疏不反注，但也不必完全遵注。古人往往尽一生精力仅整理了一两部书，现在虽可凭借政府力量，先定一个完整的规划，哪些需要大加整理的，哪些属于次要的，哪些可属于保存性的，哪些介于整理保存之间的，全盘在握，进行较易。这就因整理的部分费时较久，经济较巨；保

存的部分经济较少，只须加以标点，便可整套出书。这样兼顾，那么资金流转，比较容易，不致增加政府的负担。

二、摄印与排版并行 属于保存范围内的书籍，也可分为二类，有的只须在线装本上加以标点，便可摄印而不必排版。这些书籍可能最多，只须照丛书办法，一套一套地印行。既有利于收回成本，也有利于当前研究的需要。这是一个可以急就的办法。至于大加整理则必须排版，但为保留原本真相，也可酌量把正文照摄，减少一些错误。

三、不论整理与保存之书，均须附加索引以利检查。

四、对于其它一些不在整理保存之列者，则利用此机会选编一些其它书籍，如《全清诗》、《全清文》之类。或编一些地方性质的总集，也比较容易保存地方文献。

五、考虑到当前一些青年学习古籍有困难，建议把一些重要的作品翻译成语体，以利于广泛传播，有些作品，如诗词，翻译有困难，则可以加些通俗性的注释。

## 关于整理古籍的几点浅见

吴 泽

古籍整理是一项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能否更好地延续与发扬光大的重要工作。这是为建设高度精神文明，为子孙后代计的高瞻远瞩，我衷心拥护。但我国古籍浩繁，内容复杂，品类众多，体裁不一，如何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好整理工作，是件大事、好事，确也是个难题。兹提供两点浅见，仅供参考。

古籍整理与译成现代汉语的关系 古籍整理与译成现代汉

语,似为两事,但二者互为因果。要做到后人都能看懂,译成现代语气,须有一个注解详尽、训释无错的前提,才不致以谬传谬,贻误来者。由于古今文体不同,翻译的原则是信、达、雅,但至少要保持原貌,这样哲学著作和文艺作品的翻译就很困难了。为此,整理与翻译似宜双管齐下,例如对于研究庄子的提供《庄子校释笺注》,对于一般看不懂古文的读者提供《庄子今译》。读者看了《庄子今译》,如有志作进一步的探索,则可阅《庄子校释笺注》。

整理古籍应分别轻重缓急 古籍众多,而当前人力、物力与出版条件均有限,亟宜区别轻重缓急。个人管见重的、急的有五:一、一般群众所需的基本史籍,如二十五史、通鉴之类,亟宜满足需要;二、文学、史学、哲学中最著名的总集和别集,请陆续整理出书,以反映我国古代文化的精华;三、整理难度较大的古籍,如经部的《周礼》、《仪礼》、《礼记》,子部的《墨子》等,已濒临绝学,在老成尚未凋谢之际,急需抢救,否则后继无人;四、未刊稿本,择其有学术与资料价值的,请广为流通;五、古籍中印本少的,或初印后未曾再版过的,流传颇稀,请先作整理,如梁廷柟《南汉书》、吴任臣《十国春秋》等等,既可供史学研究者之需,也藉以防止佚失。

此外,古籍整理工作,确是我国当前文教事业中的一件有关子孙万代的宏伟事业,我们一定要做好这项工作。我国历史悠久,古籍浩繁,需要大量专业人才来担任。为此,我建议教育部和有关部门,能及时筹建一所文献专业性质的大专院校;或选择国内某些设备较全、师资较强的高等院校,再增设一些文献专业的系、科,及时地培养较多、较好的专业人才,把古籍整理、翻译工作,做得好些、做得快些,使我国悠久的优秀的精神文明,更好的发扬光大,丰富我们的新文化。这就涉及我们当前的教育改革问题了。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 浅谈古籍整理的几个问题

吴 晔

古籍整理是一项长期而浩繁的工作，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完成。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先后以二三十年时间，才整理出典籍六百零三家一万三千卷，写出《别录》和《七略》两部叙录体目录。清代乾隆皇帝动员了国家力量，任用纪昀等著名学者编纂《四库全书》，费时二十一年，校订古籍不过三千四百六十一一种近八万卷。而我国现存的古籍浩如烟海，其数量据保守的估计也在十万种以上，如果算上不同的版本和注本，就更加多。我们今天对古籍的发掘和整理也不能仅囿于校勘和考订，其工作量会比前人大得多。为此，古籍的整理工作决非短期内即可告成的，而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大业，需要周密的计划、稳定的政策和领导机构的保障。切不可一哄而上，然后不了了之，落得个虎头蛇尾，有始无终。

古籍整理工作仍应以“古为今用”为原则，而不宜以学科角度来断定哪一类优先或暂缓。在大量的古代典籍中，有灿烂的瑰宝，也有价值不大的糟粕。于今有用和相对无用的区分，不能受实用主义和所谓的“为政治斗争服务”等影响，而只能是在科学的基础上，选择出于今有研究参考价值的东西。这个选择一定要有长远的规划和科学的预见。首先要运用当前分类、主题和目录学的研究成果，对古籍进行现代的科学分类；然后由各学科领域中对古籍有一定造诣的专家来决定哪些古籍应优先整理和以什么方式整理。

在古籍整理工作中，最重要的不是校勘、注释、标点、翻译等形

式上的整理工作,而是对古籍内容的发掘。目前广大读者(尤其是文史工作者)最急需的是题录、索引、文摘、类编等提供古代典籍中内容线索的工具书。现代文史工作者的主要研究工具仍是《佩文韵府》和《十通》等前人按旧式的韵或类编纂的工具书,编纂和查找的方法既不科学,于今也大相径庭,使用极为不便,查准查全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存我国古代最大的类书、也是最常用的工具书之一《古今图书集成》,至今连一个简单的索引也没有。解放前北京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的几十种古籍引得,几十年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深受使用者欢迎,很值得我们注意。古籍整理工作应把这种工作放到突出位置。深入发掘古籍的内容,有系统地整理出一大批揭示古籍内容的二次文献,是对古代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期劳动,也是古籍整理中的一项最重要、最急需和最有价值的工作。这项工作应分为三步走:

1. 整理发掘现有的价值较多的类书,政书和重要典籍(如廿四史)编纂出一套便于今人使用该书的索引或注释。

2. 分学科编纂出按新式分类和现代查找方法的工具书,如题录、文摘、类抄等,以便分科整理和使用古籍。

3. 在以上基础上编出带有百科性质的查找古籍内容的大型工具书,并逐步建立电子计算机数据中心,用于存贮和检索古籍内容。

古籍整理是一项长期的和辛苦的工作,流汗甚多,名利却甚少。而这项工作的意义却是巨大的,任何学术成就都离不开资料的收集整理。这就需要一支不计名利,任劳任怨,有志于发掘古代文化宝藏的古籍整理队伍。他们要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较高的业务水平,老、中、青三代人结合,不懈奋斗,继往开来,完成这一功垂千秋的大业。

## 古籍整理工作的管见

### 常 教

据陈云同志指示：古书如果不加标点整理，很难读，如果老一代不在了，后代根本看不懂，文化就要中断，损失很大，一定要把这一工作抓紧搞好。古籍整理已是刻不容缓的工作，现将我个人的管窥之见，陈述于后，以就教于大方。

一、当务之急，首先把古书中无句读者加上标点和注解。古书都有训诂和文字的假借问题，因而不能注解大意。如注解大意，某个字或某个词的含义仍未解释出来，使人读之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关于注解，郭象注《庄子》、王逸《楚辞章句》与仇兆鳌《杜诗详注》等，均可师法。总之，整理后的古籍，要叫人读之能懂，看之能明白。

二、今译工作，亦很重要。搞今译工作的同志，要具有丰富的古汉语知识，既要把其内在意思翻译出来，又要符合古汉语的语法规律才可。尤其古书虚词往往某个字，在这句话中当什么讲，但在另一句话中，却是另一个意思了。例如，韩愈《师说》里的“于”字，这个字是常用的介词，但在不同的句中，却有不同的意思，比如：①“耻学于师”，是表示处所、方向的，这里的“于”相当于“向、从”。②“师不必贤于弟子”，是表示比较，这里的“于”相当于“比”。③“于其身也”，是表示对象，这里的“于”相当于“对于”。④“不拘于时”，是表示被动，这里的“于”相当于“受”。由此可见，古汉语的常用虚词，在翻译时，必须搞清楚，不能含混。

三、为了让青年能看能读，还需要加上前言后跋，把这本书产

生的时代背景、学术价值介绍出来。

四、有些古书,前人已下过一番功夫,写过一些札记,有的确实很有价值,汇集起来对整理古籍工作大有帮助。因此,古籍资料汇编工作,可以多搞。即使意见不一,亦当汇集,以作参考。

五、《四库全书》应该加以整理,公之于众。《四库全书》即使不能全部整理出版,但影印“四库”珍本的工作可以继续搞下去。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大业。

六、人员分工,务必因材使用,比如擅长哲学的负责整理哲学方面的古籍,专长文史的搞文学或历史的古籍,但绝不要滥竽充数。此外,还可以号召私人搞,但要按手续呈报批准备案,免得搞重复了,致使人力浪费。其次各省市、各综合性大学均可设立古籍整理点。总之,要有领导的有步骤的搞起来,才能事半功倍,收效较大。

## 对整理出版古籍的几点意见

林世堂

我以一个古籍爱好者的身份,结合近几年的实际情况,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提出几点意见,供有关方面参考。

解放前,特别是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和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都是大规模的古籍丛书。当前,我们整理出版古籍,和旧社会书商翻印旧书,其意义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过去较好的经验和已有的成果,还是值得采用的。遗憾的是整理出版方面对此似乎还不够注意。如中华书局和成都古籍书店,近年都翻印过《康熙字典》。它们都是根据清末日本人开办的同文书局的石印

本影印的。其实，早在抗日战争前，商务印书馆就出版过附有四角号码索引的《康熙字典》。《康熙字典》的部首编排，和现在字典中的部首不同，有了四角号码索引，对使用者来说，确实方便不少。象这样，有现成的纸型，就可以用。

其次，还有一个编排问题。我国木板古籍，对注解文字都是采用夹注的方式，即用小号字双行排在正文之下。这应该说是我们民族的传统形式。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学基本丛书”，也是采用这一形式。可是近年排印出版的古籍，都不采用这一形式了，而是把注解附在正文之后。象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历代文选》，注解和正文都排在相对两面上，读时不会有翻检之劳，读者的意见还不大。但有些出版物，注解是印在原文全文之后的，如果原文长点，注解往往在好几页之后，翻检就十分不便。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史记选》，第一篇《项羽本记》注解多到六百二十二个，第一页正文中的注解，却在十九页。这样的编排对读者来说很不方便。采用文后加注的方式，不但翻检不便，而且印张势必也要增多。如中华书局出版的《杜诗详注》，每个注解排列一行。有的注解只有几个字，也列一行，大部分版面都让它空着，有些浪费纸张。

最后，还要提一提质量问题。这不是装帧的美观和豪华，既然出版古籍了，就应该对读者负责，校对应该认真点。可有的出版社却不是这样。如有一个地方出版社出版的《浮生六记》，校对十分粗疏，这或许是个别的情况，但值得引起整理、出版单位的注意。